

花园幻象与身份建构：《天堂》中优素福的身份探寻

屠嘉盈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在文学传统中，花园常被视为伊甸园或乌托邦的象征。而作家古尔纳在其小说《天堂》中对花园意象进行了颠覆性重构，将其呈现为殖民暴力与身份规训的隐喻空间。本文立足后殖民语境，结合身份探寻理论，分析主人公优素福对阿齐兹的花园由痴迷、探寻到逃离的转变，揭示其主体性逐步觉醒的内在逻辑。所谓的“天堂花园”实为奴役穷人的囚笼，美好幻象遮盖压迫本质，而优素福离开天堂花园、奔向德国殖民军队这一选择，看似投身“地狱”，实质是主体性建立的关键一步。此行动不仅标志着优素福从被动顺从走向自主抉择，也为后殖民个体反抗提供了一种突破二元身份困境的批判性思路，同时彰显了非洲被压抑主体意识在历史话语中微弱却坚定的回响。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身份建构；花园意象；古尔纳；主体性觉醒

The Illusion of the Garde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Yusuf's Identity Quest for Identity in *Paradise*

Tu Jiaying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Shaanxi Xi'an 710000

Abstract: In literary tradition, the garden is often seen as a symbol of Eden or utopia. However,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 *Paradise* offers a subversive reconstruction of this imagery, presenting the garden as a metaphorical space shaped by colonial violence and identity regulation. Grounded in a postcolonialism and informed by theorie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tagonist Yusuf's evolving relationship with Aziz's garden—from fascination, to exploration, to eventual escape—and reveals the inner logic of his gradual awakening of subjectivity. The so-called "paradise garden" is, in reality, a prison for the poor, in which a beautiful illusion conceals the essence of exploitation. Yusuf's decision to leave the garden and join the German colonial army, though seemingly a descent into "hell," is in fact a crucial step in his assertion of agency. This act not only marks Yusuf's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submission to active choice, but also offer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how postcolonial subjects may transcend binary identity structures.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the faint yet persistent echo of African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within the larger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Identity formation; Garden imagery; Abdulrazak Gurnah; Subjectivity awakening

0 引言

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的小说《天堂》（*Paradise*）以 20 世纪初德属东非殖民地为背景，通过少年优素福（Yusuf）的成长叙事，深刻地揭示了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小说中的商人阿齐兹（Aziz）拥有一座被围墙包围的花园，这一空间意象原本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象征伊甸园式的纯洁与救赎，但在古尔纳笔下却被赋予了颠覆性意义：这个“天堂”不仅未能提供庇护，反而成为暴力、剥削与身份异化的牢笼。通过这一悖论性重构，小说不仅解构了殖民话语中所谓的“文明使命”，也直指后殖民个体的生存困境：当强权将压迫美化为乐园，被统治者应如何挣脱认知枷锁，夺回自我定义的权力？

本文立足于身份探寻理论，聚焦优素福对花园的态度由痴迷、探寻到逃离的动态变化，试图剖析其主体性建立的内在逻辑。本文采用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结合的方法，突破将优素福逃离天堂花园视为消极避难的解读，提出这一行动实则是其主体性建立的关键一步。这种“出走”不是对乌托邦的幻想投射，而是在“天堂地狱化”的绝境中，通过对压迫秩序的彻底拒绝与行动自主权的夺回，实现个体主体意识的初步确立，为后殖民文学中的身份抗争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1 幻象中的无知：初始痴迷于天堂花园

在《天堂》中，花园不仅是一个视觉与自然的意象，更是承载殖民秩序、暴力话语与身份规训的象征性空间。主人公优素福对阿齐兹花园的初始迷恋，并非简单的美学

吸引,而是其在身份悬置状态下,试图通过空间幻象探索其身份及价值认同。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文化身份远非固定的本质,而是一种历史上不断转变的过程”(Hall, 1990)。在殖民语境中,这种身份流动性往往被强权中断,使个体陷入一种既脱离原有身份,又未被新秩序接纳的状态。

1.1 身份悬置:称呼中的自我迷失

小说开篇,年幼的优素福作为抵债物被父亲“送走”,这将他突然从熟悉的家庭、语言与文化中剥离出来,进入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新世界。对于这样一位尚未具备完整认知结构和能力的儿童而言,身份不仅模糊,甚至是他人投射的产物。所以他一开始坚信商人阿齐兹是他的“叔叔”,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优素福执拗地称呼商人阿齐兹为“阿齐兹叔叔”,这一称呼成为他试图理解新秩序与自身身份的最初语义依附。然而,这一认知很快被哈利勒(Khalil)残酷地打碎。哈利勒一而再再而三地纠正“他不是你叔叔”,甚至为此出手打他(Gurnah, 2022: 27)。这一暴力矫正不仅是语言的纠正,更是一种身份系统内的权力显现。从意识形态描述角度来看哈利勒的否定性宣告,揭示出优素福的主观认同无法得到客体世界的确认,其身份陷入真空的中介状态。

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中,规训权力首先是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的,正如福柯在论述“空间的艺术”时指出,规训通过对个体在空间中的分配而展开(福柯,2010)。露台上老人们的凝视、沉默与窃窃私语,“彼此交流着会意的眼神”(Gurnah, 2022: 25),他们既不直接干预,也不给予明示,而是通过一种“在场的缺席”制造出浓厚的异样感。老人们的私语制造出一种带有审判意味的无声规训,持续提醒优素福其身份的“不合逻辑性”与“非归属感”。他无法被明确地归入这个新世界,也无法返回旧有的生活体系。

在此意义上,优素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成长中的个体”,而是一个被扔进殖民秩序边缘的被观看者,一个持续被构建、被否定、被期待的空壳。他的无知不仅是年幼所致,更是身份机制将其排斥在认同序列之外的后果。

1.2 闯入有围墙的花园:幻象中的救赎天堂

在身份迷失与语言断裂的双重夹击下,优素福将目光转向了空间作为认同安置的替代性支点。他初到阿齐兹的宅邸,对花园有着几近神圣的痴迷(Gurnah, 2022: 47)。在他眼中,花园完全封闭、远离外面喧嚣,花园里宁静清爽,有水池、树木和灌木,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和果树,香

气弥漫在空气中。这样的宁静与美好完全不同于与优素福所生活的地方,使其得以从暴力、迷茫的现实中短暂抽离。在身份悬置与认知迷茫状态下,花园成为优素福情感与认同的临时避难所,他心里无比希望自己能被永久流放在那片宁静的树林里(Gurnah, 2022: 48)。

在后殖民语境下,当既有身份认同瓦解而新的身份尚未形成时,个体往往会将情感寄托于某一具体空间,以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对于优素福而言,花园正承担了这一功能,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成为他暂时安放潜在的身份焦虑与情感需求的空间。然而,这种依赖并非源于花园本身,而是源于现实世界持续不断地暴力与失序,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反差建构出来的。小说第二、三、四章分别记录了优素福的两次内陆之旅,他去到了山乡小镇、见到了店主哈米德(Hamid)散发瘴气的后院,在旅途中他也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了饥饿、疾病、死亡、羞辱、殖民与暴力,这都与花园中的秩序、干净与美好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强烈反差不仅在视觉层面上制造幻象,更在心理层面对苦难现实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忽略,使优素福对有围墙的花园更加念念不忘。而优素福越是沉浸于花园的美好,他对社会不公与个体压迫的认识就越迟缓。这种美好感知,是在灾难背景中被人为放大的幻象。

更重要的是,花园的封闭性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它提供了优素福渴望的安全感与秩序感;另一方面,它也象征着殖民体制对个体自由的控制与规训。围墙既是庇护所,也是隔离带。它阻隔了暴力,却也屏蔽了真相,使优素福陷入一种温柔的幻象之中。这正体现了福柯所论述的规训空间(disciplinary space)的作用,即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也是权力运行的重要媒介(福柯,2010)。

优素福对天堂花园的初始痴迷,既源于他对外部世界暴力现实的认识与逃避,也源于其身份悬置状态中对归属与秩序的迫切需求。在语言系统失效、社会身份未定的背景下,他转而将空间当作自我认同的替代容器,从而将花园理想化为心灵庇护所。然而,这种基于幻象的认同注定难以持久,因其掩盖了殖民与压迫的本质。围墙之内的“天堂”表象,实则是围墙之外地狱现实的反向映射。优素福的无知不是天真的,而是权力语境中被动建构的认知结果。在这片花园中,他尚未成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而只是一个在幻象中漂浮的客体。

2 镜像中的觉醒:他者参照与意识萌发

如果说优素福初入花园时对天堂的迷恋来自于对现实的逃避和身份的迷失,那么他对幻象的逐步摆脱,则依赖

周围“他者”的映照与反射。在后殖民语境下，“镜像”并非单纯的映射，而是一种认知结构，是身份构建的通道。内陆之旅将优素福暴露在多重他者经验之中，使其得以通过观看他人来逐步建构自我。这些“他者”既包括旅途中接触的同行者，也包括活动于花园内部的个体。他们的言语、行动、沉默乃至被规训的状态，成为优素福意识转变的镜子与引子。他开始在这些镜像中找寻自我位置，意识到自己所处系统的暴力性，进而触发了对“身份建构”的反思与逃离意图的萌发。

2.1 内陆之旅：外部世界的冲击与认知的裂痕

小说中优素福的内陆之旅是其心智成熟与认知裂变的关键转折点。出发之初，他仍将这次旅行视为服务“阿齐兹叔叔”的一次荣耀之旅，充满对冒险的憧憬，天真地以为自己是被善意收留的家庭成员。然而，旅程的真实面貌很快击碎了这种幻象。

沿途的酷热、饥饿、疾病与死亡让他目睹了贸易帝国背后的血腥代价。优素福在亲历奴隶市场、殖民权力与人命如草芥的景象后，开始逐渐察觉到自己并非被照顾者，而是一个被利用、被操控的工具，必要时，他可以被丢弃在哈米德的店中，被禁锢在查图有围墙的院子。他逐渐意识到所谓的“花园”并非庇护所，而是维系这种暴力结构的装饰物，其宁静祥和只是残酷现实的反向衬托。更关键的是，旅途中他不断遇见被殖民秩序边缘化的个体：逃亡的仆人、麻木的商队成员、被俘的本地人。他们的存在打破了他对“主人仁慈”的幻想，也让他开始反思自身与这些人是否真的不同。这些反思构成了他意识裂痕的开端，为后续人物镜像的投射埋下心理基础。

2.2 他者之镜：身份意识的三重投影

如果说内陆之旅是对幻想的外部破坏，那么来自身边“他者”的投射，则是对自我认知的内部重构。哈利勒、哈姆达尼与阿明娜三人，分别以不同的姿态回应同一权力结构，他们的行为与言语，构成了优素福主体意识觉醒的三面镜子。

2.2.1 哈利勒：自我麻痹的伪装与身份的异化

哈利勒表面上是优素福的同伴，却更像是权力系统中的顺从器。他通过认同施暴者、抹平情感、压抑问题意识来实现最低限度的生存。哈利勒逐渐内化了殖民秩序的话语逻辑，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复制这种权力关系。

对优素福而言，哈利勒既是警示也是诱惑。哈利勒反复劝诫他“别多嘴”“别太软弱”，这些话语本质上是对身份思考的扼杀，是在这里“活下去”的代价。起初，优素

福虽依赖哈利勒，却对他毕恭毕敬、自我麻痹、自我戏谑的行为和语言不屑一顾。然而，在优素福经历过内陆之旅、太太引诱却故意栽赃等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逐渐开始对商人阿齐兹的身份、对花园有了新的认识 and 思考。优素福发现他没有庇护所，他心有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在挣扎与无奈中差点要变得和哈利勒一样了，“他们现在一样了，都是自愿为商人效劳”（Gurnah, 2022: 272）。哈利勒为自己的不幸编出了一种解释，说他在这里是为父亲对阿明娜的不公而赎罪，但优素福却找不出继续为商人效劳的理由。这成为优素福身份认知裂变的第一阶段：他意识到若继续沉溺于花园幻象，未来就是成为另一个哈利勒，即完全认同施暴结构、丧失自我意志的空壳。

2.2.2 哈姆达尼：身困心驰的精神自由

与哈利勒的认同麻痹截然不同，哈姆达尼这一人物展示了在束缚中保持主体尊严的另一种可能。他是花园系统最底层的边缘人之一，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中，外表疯癫、语言反常，但正是这种疯癫，却承载着清醒的自由观。

在优素福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寻找自我的关键时期，哈姆达尼对优素福说出了一段近乎哲学宣言般的话语，“他们把自由当礼物送给我，谁跟她说有权这样做……他们可以把你关起来，给你戴上镣铐，践踏你所有的小愿望，但自由不是他们可以夺走的东西……他们即使毁掉了你，还是远远不能拥有你，就像你出生那天一样”（Gurnah, 2022: 249）。哈姆达尼的“疯言疯语”由此构成对权力话语最深刻的抵抗。他不怒吼、不反抗，却以超然的平静和非逻辑的语言拆解了“合法支配”与“文明行为”的神话，他的精神之光照亮了优素福自我意识中尚未觉醒的一隅。哈姆达尼的行为与话语成为优素福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契机，他关于自由的理解，使得优素福第一次开始问：我是谁？我是否愿意成为他们口中的被拥有者？我是否还保有自己？优素福觉得老人之言虽包含着隐忍的智慧，却无能，从某种角度看确实令人钦佩，但当恶霸仍然骑在你头上拉屎拉尿时，却并非如此（Gurnah, 2022: 249）。优素福的身份意识，在哈姆达尼的镜像中转向了内心是否屈服的维度。他开始意识到：真正的选择，首先是从精神上对幻象的拒绝。

2.2.3 阿明娜：没有选择与梦的幻灭

如果说哈姆达尼代表一种理念上的自由，那么阿明娜则体现了一种深具共情力的、感性层面的身份认知触发。她的存在并不如哈姆达尼那样哲学化，却以细腻的人性 with 真实的挣扎，深刻唤起优素福的情感认同——甚至比哈姆

达尼更像“另一个被困在花园的人”，而非一个“他者”。

在阿明娜与优素福的那段私密对话中，她轻声说道：“我羡慕你，以为有一天你会看到我站在门口，并强迫我也出来……我想象你说，出来玩吧。”这段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求助，也不是浪漫幻想，而是一个被困者对另一个被困者的共同梦境。阿明娜并没有真的认为优素福拥有救她的能力，而是将他投射为梦中的行动者——那个敢于跨越门槛、拒绝沉默的人。而她自己，早已因性别、家庭与传统所限，被困于花园深处，丧失了出走的意志。她的低语，是一种温柔的提醒，也是一种隐秘的控诉。她既羡慕优素福的无根，也悲哀于自己被根深深深地固定在花园的内部，连想象自由都只能通过他者的梦来完成。她说优素福是梦想家，不仅仅是在指出他对幻象的迷恋，更是在鼓励他将梦想转化为行动。阿明娜的困境对优素福产生的震动，并非源于怜悯，而在于他在她身上看见了自身的另一种结局：若他不逃离，若他继续沉溺于“花园”的温柔乡，他终将像阿明娜一样成为知道一切，却再也无力跨出门槛的人。她所承受的桎梏，与优素福所处的系统压迫虽不相同，但本质相通——两人都在被花园驯化的过程中逐渐失语。

在旅途的苦难与他者的映照中，优素福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索”的关键转折。哈利勒代表身份异化的终点，提醒优素福：顺从非但无法换来尊严，反而吞噬主体；哈姆达尼以语言构筑了精神自由的堡垒，唤醒优素福内在的主体意志；而阿明娜以情感唤醒其行动欲望，催促他走出幻象，进入选择，这三面“镜子”构成了优素福身份觉醒的三重通道：从认知裂痕、思想启蒙到情感驱动。幻象中的天堂逐渐被剥离外壳，露出其压迫结构的本质。优素福不再是沉溺在感官慰藉中的男孩，而开始意识到“自我”作为选择者的可能。这为第三部分的“逃离”与“主体性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逃离不再是逃避，而是觉醒之后的意志表达。

3 逃离中的建立：认识颠覆与主体性选择

从被动沉迷到逐渐觉醒，优素福对“天堂花园”的幻想一步步瓦解，最终走向彻底的行动——逃离花园，加入德国殖民军队。乍看之下，这一选择似乎是从一个系统跳入另一个更为残酷的压迫体制，但在后殖民语境下，这一逃离却正标志着其从殖民空间强加身份中挣脱、向主体性迈进的关键一步。

3.1 认识花园真相：幻象的破灭

优素福曾将阿齐兹的花园视为庇护所与新生的起点——在此前的分析中我们已指出，这种依附其实源自其

身份悬置的迷茫。他被剥离原生家庭，又未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结构，遂以花园为精神替代，沉浸于其感官慰藉与形式秩序。

然而，正是在经历了旅途的暴力、见证了哈利勒的麻痹、哈姆达尼的清醒，以及阿明娜的无奈之后，优素福终于看清，所谓“天堂花园”，并不是为他提供身份认同的土壤，而是一个剥削、规训与分层的结构系统。他所误认为的庇护，实为温和奴役的面纱；他所相信的归属，不过是为强权系统输送劳动力的站点。在这一认知中，花园的边界变得清晰可感。墙内的宁静与花木，从此不再是治愈的象征，而成为牢笼的标志。而阿齐兹所代表的“宗主之恩”，也不再被解读为慈悲，他不过是殖民经济秩序中的中间人物，他一方面依赖殖民贸易体系获利，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权力进一步施加于比自己更弱势的人。意识的澄清，是行动的前提。对优素福而言，清醒地认识花园的本质，是其从客体身份走向主体选择的认知起点。

3.2 逃离“天堂”：从幻灭到决断

优素福对花园的逃离，并非抽象的象征，而是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空间转移——他最终加入了德国殖民军队，这一选择既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悖论性的决策：为何离开了看似温和的花园，却选择加入一个更具暴力属性的殖民机器？德国军队在小说中象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权力，是对非洲土地与人民更为直接的侵占者。难道优素福只是从一个压迫体制走向了另一个压迫体制吗？

这一选择的复杂性，在于它不能从道德或历史的单一维度加以理解。优素福的逃离不是对殖民暴力的顺从，而是对花园系统强加身份的拒绝。相比阿齐兹建构的等级化、家长式规训空间，德国军队虽然暴力，但它允许优素福以士兵身份参与到系统中，这种参与虽然仍在压迫结构中，却为其提供了一个主动选择的入口。他不再是父亲的抵债物、不再是被阿齐兹带走的孩子、不再是命运由他人掌控的附属品，而是第一次以意志作出决定的主体。这种逃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通向理想之地，而在于它本身是一种断裂——对幻象的断裂、对压抑的断裂、对自我麻痹的断裂。正如《后殖民主义关键概念》中所言，后殖民主体的抗争常常不是通过构建乌托邦实现，而是在断裂中寻找主权重构的可能。优素福的行为，正体现了这一点。

3.3 主体性的建立：在空间决裂中生成自我

逃离，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出走，更是象征性的宣言。通过逃离，优素福打破了被动等待、被命名、被利用的结

构性状态,开始生成对“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的自主叙述权。

这标志着其身份逻辑的根本转变:从最初的结构性身份悬置状态,到镜像觉醒中的身份意识激活,最终以逃离行动完成主体自我设定。这一转变符合斯图亚特·霍尔对后殖民身份理论的表述——身份并非“固定本质”,而是在不断的断裂、流动与差异中建构的开放性过程(Hall, 1990: 225-226)。优素福加入德国殖民军,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也不意味着他认同殖民权力。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标志着他第一次主动决定自己的去向。正如 Hall 所强调的,身份并非既定的本质,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关系中持续生成。优素福并未完成身份建构,而是在主动离开花园的过程中开启了新的身份实践。因此,这一行动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目的地,而在于主体开始拥有了选择本身。最终,优素福不是通过战斗成为英雄,也不是通过爱成为浪漫化的逃亡者,而是通过“离开”成为一个拥有决断能力的人。被殖民者的主体性,从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过程。优素福的逃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标志性节点。

4 结语

尽管《天堂》的结局并不美满,人物依旧困于各自的

沉默与痛苦中,但优素福奔向德国殖民军队的出走行为,却成为全书最具力量的瞬间。他的选择并非投身另一重压迫,而是以行动拒绝被命名、被规训的身份幻象,是在无声中发出的自我呼声。这一“出走”的意识虽仍模糊,未指向清晰的自我认同,但恰恰体现了被殖民者在迷失中的主体觉醒。古尔纳通过优素福的沉默抗争,呈现了非洲个体在殖民历史结构中试图挣脱束缚的复杂过程,也为思考后殖民创伤与出路提供了新视角。这不仅是个体的身份挣扎,更是非洲自身历史话语的回响,一次对欧洲中心书写的深刻松动。在幻象的废墟中迈出的这一步,也许微小,却已开启未来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Hall, Stuart: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Jonathan Rutherford, (Lawrence & Wishart, UK, 1990).

[2]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天堂》[M]. 刘国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作者简介:屠嘉盈(2001-),女,中国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